

花布为媒,我们的爱走过了65年

■倾诉人:闵桂芳
女 82岁 白下区

17岁时,家里就给我做了媒

1926年,我出生在南京一户普通人家,家中兄妹四人,我是最小的一个。母亲没有工作,靠父亲做医生挣来的钱养活一家人,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过年时,我会和母亲一起去市场上买些好肉好菜,回来精心烹调一番。父亲思想过于“开明”,家里也从不贴些对联窗花等应节装饰。不过,和别人家一样,父亲也常常会给我们发“红包”,拿着这些钱,我会和门口的小伙伴们跑去不远的夫子庙逛上一大圈,买些棉花糖之类的小吃尝尝鲜。

我14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原本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戛然而止了。家里少了顶梁柱,经济上大不如从前。大姐早已出嫁,两个哥哥在商店里站柜台得来的工资就是家里全部的收入,填饱肚子就是我家主要的生活目标。

后来,两个哥哥中的一个当了兵,另一个因为工作的原因,过年时也不能回家,家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两个人。因为经济紧张,即便是除夕之夜,我们也只能买些菜,两个人随便吃一点,经常是冷冷清清就把年给过了。

因为家里的生活条件有限,我17岁那年,母亲就开始张罗着给我这个到了婚嫁年龄的小女儿找户好人家嫁出去。邻居阿姨了解母亲的心思,便跟我母亲提起了她的一个远方亲戚,一个在天福和布店里工作的名叫李剑秋的男人。

相识第二年,我做了他的新娘

那时,人们的观念没有现在这么开放,直到在媒人的带领下我在布店里与他初次见面,也不知道这个男人竟是邻居阿姨给我介绍的对象。

那天,邻居阿姨跟我说:“桂芳,我想做身衣裳,走,陪我去布店买块布料去!”由于我还被蒙在鼓里,当即就随阿

我和老伴的结合,并不浪漫,更没有一丝波澜,到今年,已经是我和老伴携手走过的第65个年头了。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健健康康地携手到老,哪怕坐着轮椅,慢慢聊。

正月初三是老伴的生日,每年的这天,所有的晚辈都会聚在我们家,四世同堂,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刻。春节、老伴生日双喜临门,虽然我每次都会忙上半天,但还是很开心。



姨出了门。到了店里,阿姨把我带到一个柜台前,在热情的售货员小伙的殷勤服务下,又是介绍花样又是丈量身材,好一通忙活之后,阿姨终于挑中了一块漂亮的花布。回家的路上,阿姨对我把这个售货员好一顿夸:“这个小伙子不错,真会做生意啊,你觉得呢?”我不明所以,回答她说:“还真不错!”

第二天,母亲才把真相和盘托出,我恍然大悟,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想想自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也就同意了。

在那个民风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年代,即使是在媒人的撮合下男女相识了也不经常来往,看上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三个月后的一天,气质文雅的他拎着一包桂圆和一只鸡蛋糕,在媒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家,简单地聊了聊家常,不多久便起身离开了。之后的日子,我们的来往就多了起来,他下班了,常从我家绕一圈再回去,谈谈生活,谈谈工作。

不久,我们两家就举行了订婚仪式,两张鲜红的订婚证书如同红线,把我们两个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因为他家的条件好,还做了一对订婚戒指送给我。

第二年的一天,他家请媒人上门提亲,接下来关于婚礼的一切都顺理成章。1944年的农历四月初八,18岁的我和大我6岁的李剑秋走进了

婚姻的殿堂。一个脚盆,一个马桶,四季衣服再加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是我全部的陪嫁。结婚那天,我第一次坐上了轿车。穿着旗袍的我,穿着大褂的他,在位于夫子庙的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里,没有复杂的仪式,坐满了八张圆桌的亲朋好友见证了我们的结合。婚礼结束,我随着他,住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家。

结婚第一年春节,我不敢打麻将

我们的新家位于马道街的一套一进三间的房子,虽说与公婆以及叔叔嫂子住在一起,但我们夫妇二人仍然能独享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他家是个传统的大家庭,老人掌管家里的大小一切事务,我安心地做起了全职太太,平时只管做家务,经济上的事从不关心。虽说我是刚进门的媳妇,但与他一家的关系相处得都十分融洽,也让我欣慰不少。

到他家里的第一年春节,家里人很多,大大小小十几口人聚在一起,十分热闹。厨房里架上大锅,烧起了大灶。一锅糯米一锅大米总共要烤两大锅锅巴,可以图个吉祥如意。从初一到初三,不断地有亲朋来拜年,家里随时都备着招待用的年货。其余时间,家里人会在一起打打麻将。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我这

个新媳妇绝对不敢上桌打麻将。那一年春节,我的娱乐也仅限于和亲戚朋友聊聊天,虽然多了些拘束,但比起自己家里,还是温暖得多。

老伴身体健康,是我最大的心愿

婚后的生活很平静,也很幸福。我们先后育有三男四女共七个孩子,那时,孩子们都还小,常常这个哭完那个闹,我性子急,孩子一哭闹我动手就要打。而多年私塾的熏陶,使他脾气特别温和,每到我即将对孩子动手的“危急关头”,他从不说话,只把孩子往他怀里一抱,算是给我一个台阶下,也护住了孩子,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几十年的光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的我们,早已儿孙满堂。每年的正月初三,是老伴的生日,也自然成了我们全家相聚的日子,四世同堂,每到这一天,家里总能站满一屋子的人。

今年的正月初三,是老伴88周岁的生日,24个晚辈一起聚在我们家,不大的房间摆了两张圆桌。女儿心疼我,不仅帮我去菜场买了菜,还主动帮我打下手,鸡鸭鱼肉再加上时令素菜和汤,做出了两桌丰盛的菜肴。儿女们在家里团聚到晚上才离开,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也特别高兴。

现在,我们的年龄都大了,尤其是近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常常犯糊涂,为了照顾他,我连大门都不敢出。尽管我尽全力照顾他,他还经常不听劝,跑出门去。过年前,他趁我不在意的時候开了门就出去了,等我发现时,他已经倒在门外摔倒在地好久了,我把他扶起时心里既恨他又心疼他。

按照南京人的说法,明年,就该给他做89岁的大寿了,我要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到时,我们全家真得好好地聚一聚。

实习生 吕为快 报记者 钟晓敏 整理

历史进入2009年,“二嫂”已离开我们近三十年了。这些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二嫂”何许人也?不知道的人都把他当成女同志,其实他是一位壮实的男子汉。

倾诉人、执笔人:韩万生
男 63岁 退休工人 鼓楼区

我们的知青“二嫂”



“文革”期间回南京,我(右一)和“二嫂”(左一)同游中山陵

“二嫂”其实是个大男人

“二嫂”真名叫杨惠奇,原南京八中(现为田家炳中学)65届毕业生,当年响应号召去新疆阿瓦提丰收三场三连。因为他为人憨厚,做事细腻,乐于助人,在家又排行老二,所以大家称他为“二嫂”,并一致推荐他为事务长。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供应极为匮乏的边疆农场确实是一件美差,但他从不损公肥私。

记得连队难得杀次猪,当时可不比现在,很少见油水的知青们个个要肥不要瘦,吵得面红耳赤,他每次分肉不但都在最后拿,还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当时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七十的霉玉米面,百分之三十的麸子面,“二嫂”每月都把那点可怜的麸子面让给病号和孕妇,自己啃玉米馍。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他经常赶车长途跋涉几天,穿戈壁,过沙漠,去兵团农场,人民公社用玉米面换大米,采购葫麻油和水果,分给老弱病残孕的同志。

“文革”期间,知青们纷纷外跑,他和少数几位同志留在农场坚守岗位,看护着连队的固定资产。他得知我们几位老弟兄即将返疆而无住处时,独自一人挖了一间近百平米的地窝子(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简易房)。

结冰的湖面要了他的命

1979年冬季,知青们开始逐渐返宁顶职,暂不够条件的“二嫂”心中既羡慕又焦急。为送先行期回宁的战友,他和另一位同志去附近的兵团农场采购点水果,他叫那位同志赶车先行,自己骑车随后,可赶车的同志到了目的地等了两天也没等到他,当时既无电话更谈不上手机,只得原路返回。到连队一问,得知“二嫂”早已随行。这下连队可慌了,全部出动沿车道寻找,最后在靠车道的一个冻得很结实的冰湖上发现了他的皮帽。同志们立即在发现点砸开冰层,用铁钩下去搜索,很快就钩上一辆自行车,但是始终找不到人。大家不停地砸冰以扩大搜索面,终于在靠岸的冰层下找到了“二嫂”的遗

体,当时他的双手朝上,呈击冰的姿势。寒冬腊月的新疆,我们也常在冰湖的上骑车溜冰,那“二嫂”是怎样掉进冰湖的呢?据现场分析,他当时在冰湖上骑车上岸时,因速度快而滑倒,当时一直滑到湖中心,而湖中心的冰层相对又薄,冲击力又大,所以连人带车掉进湖中。他想从水中爬到冰上,可冰支撑不了他的体重,刚爬上冰又塌下,他只得从水中潜入到岸边的冰层下,想从下向上顶开冰层以求生,结果因岸边冰层太厚被憋死。

“二嫂”死后,全连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特别是那些即将回宁的知青,因为“二嫂”是为他们而遇难的。为了满足远在南京的亲属要求带回骨灰的心愿,知青们彻夜未眠,男同志用核桃木做骨灰盒,女同志缝衣做被,再用一只汽油桶从纵向切割开,又把割开的两片横向对焊起来,就形成了一只凹形铁皮槽。遗体放入其中,浇上汽油,架在红柳柴堆上。在知青们撕心裂肺、捶胸顿足的哭喊中,在一阵浓烟中,“二嫂”的身躯融入新疆的长空大地。

聚会时,为先走的他们摆上一双筷子

进疆十几年来,我们丰收三场一千一百名南京知青中有二十多人因各种原因长眠在戈壁沙漠中,与我同去的校友(原南京十一中)就有黄文苏、常付江两位同学不幸遇难,岁月的流逝抹不掉他们的无尽思念,每逢老知青们聚会,首先给他们倒上一杯酒,摆上一双筷,点上一根烟,呼唤一声他们的姓名。

当返回第二故乡——丰收三场时,下车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扫墓。前几年,在江苏电视台“情感超市”的摄制棚里,数百名原丰收三场南京老知青欢聚一堂,怀念蹉跎岁月,追忆那难忘的年代,当屏幕上出现了他们的姓名时,无论在摄制现场,还是荧屏前的老知青,无不痛哭流涕。

现在,当年的老知青又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挫折,但一想到在冰水中挣扎求生的“二嫂”,想起那些至今长眠在农场的战友,我们还有什么抱怨的呢?毕竟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中,还有很多机遇。

你在他乡还好吗?

那时候,我供职于一家小公司,公司有四个老板,彬便是其中之一,他其实比我还小两岁,但待人处世却处处透出干练、成熟。

公司人员杂,效益一直不是很好,但我和彬却很投缘,他会给我讲他的创业史、恋爱史,而我也告诉他我以前的种种不顺和烦恼,就这样,我们相互鼓励着。他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外地人而且家境富裕,又是独女,而他家庭条件不太好,投资公司还贷了款,他只有取得事业的成功才能得到女孩家人的认同,事业和爱情对他来说是合二为一的,每当这时,他的眼神总充满了忧郁。

尽管彬很努力,但公司的经营还是每况愈下,到后来也只能是硬撑了。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彬告诉我他女朋友和他分开了,他的表情有些僵硬,一整天没怎么讲话,拿着拖把到处打扫卫生,看着他的背影,我有说不出的心酸。

公司最终还是决定在年底的某一天关门,虽然早知道

这一天会到来,但大家还是很伤感。我去彬的办公室把刚拿的工资塞给他,他不肯接受,我放在他办公桌上:“就当借给你的吧,过年了,总得为父母买点东西吧!自己委屈没有理由让父母跟着委屈!”他的眼眶红了,我不忍再看他,就在我转身离开时,他忽然叫我:“你还会陪我吗?”我一愣,随后便明白过来,“当然!”我长长吸了一口气……

就这样,失去工作的同时我收获了爱情,戏剧般由观众变成了女主角。

我们的爱情注定了要在狂风暴雨中生长,当时彬不仅没有工作还背负了一笔债务,学历没我高,年龄也比我小,他的这些硬条件自然受到我父母的强烈反对,而我也悲哀的发现我不够勇敢,无法举行一场没有父母祝福的婚礼。于是,我们又有了第二个约定,他让我给他两年时间,他会在在这两年里,努力再次创业……

那年春节后,彬便去了北京,他计划边工作边寻找创业

机会;为了逃避家人的压力,我投奔了上海的外婆,并在那里找了工作。

又是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公司确实走不开,而我也也不想回家面对家人,除夕那天,我正和同事们一起精心布置宿舍,彬竟微笑着出现在门外,事先没有一点预兆,“我给你带了点礼物,只能给你点小惊喜再多陪陪你!”他的眼睛闪过一丝无奈。

第二年我们心照不宣不提未来,彬还时而过来看我,每次我心疼钱时他总敷衍说:“钱花得值嘛!能来一次是一次了。”我也不敢往下追问。终于下了决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那里有份不错的工作。我离开那天,彬来了,他还买了点礼物送给我外婆,“至少以后你家人谈到我,你外婆还能说起我一点好吧!”他想开个玩笑,我却笑不出来。没有提分手,我走了,但没有给他留地址,他也始终没有问。

几个月后,他告诉我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明知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但握住电话的

我还是泣不成声。接下来的一年,我有了男朋友。年底接到彬的短信:“抱歉,今年有点小意外,钱要明年才能还上!”几经犹豫,我还是打了电话,电话是他妻子接的,她说彬病了,休息大半年了,情况不是太好,现在每天挂水。放下电话,我才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只能默默为他祈祷。再后来,我也结婚了,我换了手机号码。

两年后当我试着用公用电话联系彬时,发现所有的号码都成了空号。

现在,我偶尔会想起彬,他一定会生活在某个地方,只是不知道——彬,你在他乡还好吗?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
信箱:kbinsheng@126.com;论坛:www.dsqq.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